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丛书

科学历史观 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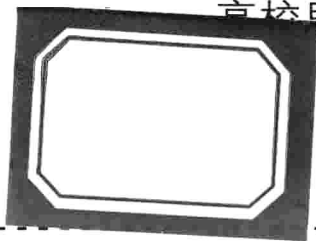
KEXUE LISHIGUAN
DAOLUN

主编 顾晓静 吴本荣
主审 王雪峰



南京大学出版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丛书



KEXUE LISHIGUAN DAOLUN

科学历史观 导论

主编 顾晓静 吴本荣
主审 王雪峰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历史观导论/顾晓静,吴本荣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305-09538-2

I. ①科… II. ①顾…②吴… III. ①历史唯物主义—概论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030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科学历史观导论
主 编 顾晓静 吴本荣
责任编辑 文 月 编辑热线 025-83580609
审读编辑 徐 良

照 排 淮安市亨达印业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雄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54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538-2
定 价 2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446164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高 明

成 员:王雪峰 高 明 何学军

黄爱宝 顾晓静 张 宏

吴本荣 黄 健

本书受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与管理学科群基金、2012 年南京工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和 2011 年南京工业大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经费支持

突出“四观”内容，努力改善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代序）

努力改善教学实效性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核心目标和永恒主题，其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这一改革不仅应体现在教学方式、手段上，也应当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切实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与人生所需，是教学内容改革的关键。基于此，南京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导小组指导下，在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与管理学科建基支持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需要，组织教师集体编著《科学世界观导论》、《科学历史观导论》、《科学发展观导论》和《科学人生观导论》。编著这四本教学参考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针对大学生世界观、历史观、发展观和人生观的实际需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

世界观决定大学生能否正确地对待客观世界，人生观决定大学生能否正确地对待主观人生，发展观决定大学生能否正确地对待社会、对待国家，历史观决定大学生能否正确地看待历史、判断未来。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发展观和人生观属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说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针对众多具体问题的知识和结论是金子，那么科学的“四观”就是点金术。让大学生接受并掌握“点金术”，无疑将有助于他们真正认识、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金矿”。

《科学世界观导论》和《科学历史观导论》的编著，希望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内在魅力，并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使大学生能通过自己的逻辑推理得出心悦诚服的正确结论。《科学发展观导论》的编著，希望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热点话题，通过类似理论观点比较分析以及现实情况辨析来引导大学生展开思考和讨论。《科学人生观导论》的编著，希望结合当今大学生的人生实践，通过对现实问题与困惑的辨析来指导大学生掌握正确的人生哲理，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人生。为了鲜活地展开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发展观、人生观的阐述并有力地证明其中核心理念、方法的正确性，这四本



书的编著者们还将系统地建设相应的案例库。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多和学时少的矛盾,缓解这一矛盾的根本路径在于讲授的内容“要精要管用”。这就是说,在具体讲授时必须突出一些重点内容,并以此带动大学生对其他内容的自觉关注和主动学习。组织编著这四本教学参考书也是实现此目的一种尝试——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内容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放在能够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热点话题上。

编著这四本教学参考书本身也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编著这四本书,可以发挥教师在相关专题研究上的特长,进一步将教师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并通过教学实践,即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不断检验教师的科研水平,从而再次激发教师对相关专题研究的热情和投入,也有利于建设一支优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四本书的编著仅仅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尝试,必然会存在许多肤浅与不足,诚恳期盼学界同仁给予更多的包容和更好的指教。

是为总序。

王雪峰

2011年7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	1
第一节 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历史观	2
第二节 烈炼成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16
第三节 以史育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与科学历史观教育	26
第二章 旗帜——中国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6
第一节 存在与意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	36
第二节 苦难历程——百年中国国情	41
第三节 睡狮梦醒——百年中国思潮	51
第四节 理想信念——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60
第三章 旗手——中国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75
第一节 人民群众——历史的创造者	75
第二节 大浪淘沙——近代中国各阶级及其代表的表现	80
第三节 独领风骚——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90
第四章 道路——中国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	117
第一节 社会矛盾——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117
第二节 理想、制度与实践——近代早期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127
第三节 历史抉择——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138



第五章 视角——新史观面面观	160
第一节 历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历史观	160
第二节 文明史观——从人类文明发展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	169
第三节 全球史观——从世界看中国	179
第四节 现代化史观——从中国看世界	190
后记	202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恩格斯

第一章 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

什么是历史?

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然后是历史认识或历史理解,最后是历史话语。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和表述历史的话语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形成历史呈现中的价值判断。

历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指的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狭义的历史仅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即人类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人类的全部过去。但这种“原意的历史”已经消失,我们并不知道它。我们知道的乃是史学家或我们自己根据所接触到的历史资料(文献、文物、口碑)和自己的历史观,经过选择、解释、判断写出来的历史,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即历史学。与历史的概念相对应,历史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我们学习历史,或“以史为鉴”,是指“写出来的历史”,亦即人类所认识的历史。这种写出来的历史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原意的历史,一方面决定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决定于写作者的历史观。

那么,什么又是历史观呢?

既然历史是史学家对过去的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载,就必然包含着他们的价值判断,这就是历史观。

从本体的角度而言,历史是客观的,不被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增损其分毫;从认识的角度而言,历史又是主观的,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记忆和思考,同样一部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对其会有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看法。因此,我们要掌握科学的历史观,正确地认识历史,更好地认识现实。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与历史观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由



于对历史观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第一节 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历史观

一、历史观的起源

历史观起源于人们对劳动及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思索。在人类的早期,人们在认识自然的同时也对本身的相互关系有了朦胧的认识。随着社会关系的逐步发展和日益复杂化,人们对社会的哲学思考也逐步由对某些社会现象、社会侧面的认识发展为对社会一般问题的研究,并形成各种理论体系。

原始人尚不具备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明确区分开来的能力。他们所从事的狩猎、捕鱼劳动,仅以满足直接需要为目的。农业生产较长的周期性虽然要求人们对眼前活动的后果有一定的预见,但人们本身的力量与巨大的自然力相比却十分弱小,原始人只能以想象的神奇力量与神秘的自然力相对抗,并由此产生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这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混沌不分的认识状况一直影响到奴隶社会早期的思想家,使得他们的哲学思考致力于寻找世界永恒的始基。水、火、原子、数等曾被认为是构成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实体。这时社会历史观还浑然一体地包含在一般的世界观之中。

随着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分工和阶级对立日益深化,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如国家政治生活,呈现出与自然界显然不同的变化节奏和特殊形式,这时人们开始对某些社会现象作专门的考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可以看到,人类逐渐开始了对社会起源问题的思考。

二、中国主要的历史观

(一) 中国古代的主要历史观

中国古代历史观十分丰富,从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看,有天命史观、圣王史观和民众史观等;从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看,有循环史观、进化史观等;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有“大一统”史观等。

1. 天命史观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天人关系主要是探讨“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发展变化。天人关系经历从“天命”决定人事,到轻视“天命”、推崇人事的演变过程。甲骨卜辞





以及鼎器铭文上多次出现“受命于天”的刻辞,《尚书》明确记载着“天命”的字眼,其时“天命”的概念是主宰人自身的,直到春秋战国开始有人怀疑“天命”的存在,再到秦汉之时则是努力摆脱“天命”的束缚。

天命史观强调上天的旨意可以主宰社会治乱和人的命运,天是决定者,命是必然性,“天命”是决定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王朝兴亡的终极原因。夏、商、周三代统治者认为“天”是人间的主宰,夏人认为自己受命于天,从天命而行;殷人迷信鬼神,关于民心向背、战争胜负、城邑兴建、官吏陟黜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天和祖先进行祈祷或请示;周人认为不能仅信天命而不尽人事,天命必须和人事相配合。夏、商、周更替的事实更使周人认识到:“天命”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是永恒的,“天命”只垂青那些布施德行的君主和政治昌明的王朝,只有尽到“人事”的王朝才能永远享有“天命”,只有知天命、顺天命、不废人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司马迁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重视人谋,但并不否认“天命”。董仲舒为解释君权的合法性,主张“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将天命观发展到极致。天命史观既为中国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也为推翻一个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2. 圣王史观

中国古代的圣王史观渊源于远古神话传说。圣王往往被描绘成社会的主宰和历史的创造者,决定和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把人类社会的演进说成“有圣人作”的历史,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创造归功于圣人。孟子言必称尧舜,认为圣贤决定天下治乱、王朝兴废、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等,历史的发展是圣人造成的。陆贾把圣人分为三个时期:先圣包括从伏羲、炎黄、尧舜禹到他们的臣子,他们首先创造物质文明;中圣主要包括商汤、文王、武王、周公,他们制定礼乐;后圣指孔子,他建立教育体制。韩愈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借助于作为人之特殊的圣人才能生存和发展。

圣王史观强调圣人明君是左右历史命运的决定力量,能够决定一国的兴衰更迭,贤明的君主使得国家达到“治世”,而昏庸的君主则是“衰世”出现的主要原因。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其道德修养不但是他本人的事情,而且关系到百姓的教化、官吏的治理,人民趋从君主,并不是听君主讲什么,而是看君主做什么,君主“动有仪则令行,无仪则令不行”。

3. 民众史观

民众史观推崇民众是决定统治者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统治者的政治活动须重民、亲民,才能赢得民众的真心拥护,借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认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主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的就是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管子把老百姓当做国家的根本、社稷的基础，体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他认为民生是关系到国家昌盛、民族兴亡的大事，统治者要为民众谋福利，解决好民众的衣食住行，使民众过上富足生活。民富则国富，国富则易治；反之，民穷则国衰，国衰则易乱。当然，中国古代“重民”、“恤民”，但其核心不在“亲民”、“为民”，而在“使民”、“驭民”，旨在构建一个纲常有序、人有等差的人伦社会，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

4. 循环史观

就历史发展方向来说，历史循环论者认为历史进程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是治乱交替不断向前发展的循环变易。《易经》中就有“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衰相继”、“刚柔相克”等天道循环概念。“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认为圣王和命世之才的出现以五百年为准，历史进程也以五百年为单位循环运行。邹衍的“五德始终说”用水、火、木、金、土的相生相克来比附王朝兴衰的循环变化，是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新的统一封建王朝寻找理论根据。董仲舒以“治乱相嬗”的历史循环论解释王朝的更迭和统治形式上的某些变化，其“三统说”认为历史是黑、白、赤三统相继更替的历史。《三国演义》第一回的开场白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奉行的亦是如此反复的循环史观。朱熹则把人类历史当做一个多层次、盛衰交叠的发展过程，其中大循环套小循环，大治乱周期套小治乱周期。

5. 进化史观

中国古代哲学中存有“变易”的优良传统，起源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其基本思想之一就是变化发展。“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以“变易”观念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探究事物变易的思想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和进化的，历史不会倒退，因而复古是不可能的，他基于对人类社会由“上古”、“中古”、“近古”到“当今”的发展过程，指出不要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如果以先王之政治理当世之民无异于守株待兔，应“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具体的政策。朴素的进化史观成为先秦法家变法革新的理论依据。东汉时期，王充把“天道自然”的基本观念应用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上，认为国家的治乱，王朝的兴替，都是客观的必然过程，在反对崇古非今的历史观中透露出一些发展变易的观点。唐代的柳宗元不自觉地承担起封建社会前期历史变易观的总结工作，形成重“势”的历史发展观，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它有着自己固有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明代的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柳宗元重





“势”的历史观,提出“理势合一”,要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去探寻它的规律。尤其是对历代制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就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这就是“一代之治,各因其时”的合理性。他痛斥一切退化史观和复古理论,肯定历史是进化的,历史的发展总是后代超过前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朴素进化观在理论上没有发展到更加缜密的阶段,但它作为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在中国史学上有古老的传统和广泛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接受近代进化论的一个思想基础。

6. “大一统”史观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大一统”最早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后来引申为封建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大一统”史观以政治一统为核心,文化一统是政治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民族一统是政治一统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体现。

先秦诸子大多有“大一统”的思想,主张天道一统,江山一统,治权一统,政令一统,帝位一统,王道一统,文化一统,华夷一统,天下一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提出“一同天下”的说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认为只有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大一统”的观念在秦朝以后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追求疆土、风俗的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大一统”主张不仅要求思想统一,还要求国家统一,反对诸侯分裂割据;政治统一,加强中央集权。

中国历代王朝的分分合合、政权的更替变迁无不发生在“大一统”的框架体系内,各个封建政权无不以“大一统”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大一统”观念也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不断得到充实强化。“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

(二) 中国近代的主要历史观

中国近代(1840—1919)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救亡图存与国家自身的近代化成为同等重要的大事。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量思想家都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他们为救治中国社会的痛疾提出了各种药方,虽然有些药方可能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但是他们的宝贵思想却给后人以很多启迪。

1. 变易史观

近代思想可以从龚自珍、魏源开始,他们都持变易史观。

龚自珍提倡“及时更法”,积极为变法革新提供理论武器。他还探讨了帝王国家、礼乐刑政、伦理道德的产生,提出了独创见解。他否定君权神授、圣人制礼作乐





的传统迷信,否定仁义道德是上天意志、圣人意志或天赋良知的说法,明确提出“先有下而渐有上”的观点,这对于君权神圣的说法作出了否定,具有积极进步的历史意义。

魏源则反对复古,为变革作了多方论证,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驳斥了当时大多数人认同的厚古薄今的历史退化论,对于人们观念的更新起了积极作用。他还提出“众人意志”高于圣王意志,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含有革命启蒙的因素,也打击了当时顽固保守的势力。

但是龚自珍和魏源都不赞成骤变和飞跃,只求渐变。尽管对封建社会的弊端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但他们衷心拥护封建体制,对封建体制是爱之深、痛之切的,不希望改变这个体制,他们始终认为“势变道不变”,把封建制度看做是神圣而永恒不变的,因此他们只能提出改良社会的药方。

2. 进化史观

康有为、梁启超的历史观是进化史观。康有为提倡托古改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把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相结合,提出了“公羊三世”进化史观。他认为,宇宙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变”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他还进一步指出,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进化的。他把进化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人类社会由“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这是普遍规律。对董仲舒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了公开否定,认为封建制度并不是永恒的,社会必然要向前发展进化。

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思想,突出宣传了“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论证了“法何以必变”。站在进化论的立场,梁启超热情地歌颂“开新”,反对守旧,提出了“今胜于古,后胜于今”的进化史观。梁启超指出历史发展进化“非为一直线,尺进而寸退,大涨而小落,象如一螺线”,形象地说明了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他批判了孟子“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丰富了康有为“公羊三世”说,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民主取代专制的历史必然性。

虽然康有为、梁启超大讲“变者天道也”,但是他们所说的变乃是渐变,虽然大讲发展进化,又否认社会进化过程中的飞跃、革命。他们把事物的进化发展完全看做是一点一滴的逐渐积累的过程,把君主立宪说成是社会发展的不可超越的必经阶段。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维新派的其他成员,后来又成为保皇党人反对革命的工具。

3. 革命史观

近代持革命史观者以孙中山和邹容等人为代表。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他说:“就历史进化的道理来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人类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着纯粹的数量变化,而且还有着“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各





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变,“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孙中山正是用进化的理论武器宣告民权时代的到来,号召人们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民权革命,并把民权革命看做是历史进化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赋予进化论以革命的内容,这是孙中山历史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反对庸俗进化论。他指出:当今世界上君主立宪制已经过时,已经有了更先进的民主制度。所以,一个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无需再经过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的过程,同样可以实行最新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强调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但并不否认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提出“突驾”说,主张人力胜天。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地大物博,只要奋发有为,发扬本国固有的文明,并积极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就可以后来居上,不仅可以“突驾”日本,而且可以超过英美。他主张用破天荒的“突驾”,采取革命手段完成由君主制一跃而至民主共和的进化次序,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邹容认为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自从达尔文进化论传入中国后,进化史观就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引导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但是在此之前,康有为等维新派思想家论历史进化,只讲渐变而否认突变,认为渐进的改良才是社会发展进化的唯一正途,进而否定社会革命。邹容则明确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当旧制度、旧政权业已腐败不堪,完全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时,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社会历史的进步。革命是社会历史进化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邹容在其代表作《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了清王朝的统治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他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4. 民生史观

孙中山认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不是冲突,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他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按照互助的原则,不断地求生存,社会才能不停地进化。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这里的“民生”主要是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经济问题。民生史观认为民生就是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社会进化的重心。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而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民生史观还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民权革命是历史进化势所必至的世界潮流,社会历史的发展,“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所有这些,都是民生



史观中包含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但是,民生史观把“人类求生存”的“本性”和“欲望”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对“民生”作了抽象的脱离具体社会内容的超阶级超历史的理解,甚至说“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因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近代中国从变易史观,到进化史观,到革命史观,再到民生史观,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历史观内含的使命,全面地折射出中华民族以变促新、以变求进的觉悟过程,为近代中国自改良至革命的救亡强国之路的渐次选择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与主动性。但是,直至李大钊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前,上述历史观均未能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指导思想。

三、西方主要的历史观

(一) 古希腊罗马历史观

欧洲人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称作“古典时代”。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泉,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而古罗马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主要继承、发展和传播者,古希腊文明正是通过古罗马人的新发展才得以深刻影响了整个欧洲。

1. 英雄史观

一般认为古希腊史学是西方史学的开端。上古时代的历史只是以传说的方式保留在先民的记忆中,但这种传说已包含了一定的历史观。荷马史诗是西方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代表,我们能从中看到上古传说中包含的历史观。

上古时代是人类的英雄时代,上古传说是英雄的史诗,荷马史诗也不例外。荷马史诗中叙述的就是希腊祖先的英雄事迹:与异族的战争和与大自然的斗争。这两者构成了上古时代人类生存斗争的主要内容。前者主要反映在《伊利亚特》中,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在《奥德赛》中。史诗充满了神话和传奇色彩,诗中的英雄不是具有神的血统,就是具有神的力量。英雄时代的史诗宣扬的是一种英雄史观,正是人类的英雄祖先创造了人类的历史。这种史诗的创作和流传并不只在于娱人耳目,更重要的是启迪心智,告诉人们,他们的来历和归宿,也即回答人生最首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它昭示人们继承英雄祖先的荣光,向英雄祖先那样去从事生存斗争。史诗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一个有着英雄祖先的民族是值得自豪的,正因如此,当时希腊各城邦都竞相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尊为自己的祖先,甚至连荷马本人也成了争夺和崇拜的对象。荷马史诗并非一个人的创作,他是保留在全体希腊人记忆中的希腊历史。这种英雄史观代表了一种血缘上和文化上的认同,而这正是历史的最初和最基本的价值所在。

2. 循环史观

在古希腊人看来,神明所创造的人类世界,最初是完美的,但它并非不朽,在它





之中就已包含有衰退的种子,随时间的推移,人类世界的历史将不断倒退,当倒退到终极的状态时,神明便插手改造使之又恢复到原初的完美状态,如此循环不已。

最早表现这种思想的是彼阿提亚的农民诗人赫西俄德。他在其教谕诗《田功农时》中提出,混沌初开,万物衍生之后始有人类,人类社会经历了五个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当潘多拉将包含“生命的罪恶”之盒的盖子打开时,黄金时代便结束了,其后的每一个时代都比先前的时代更加糟糕、更加堕落、更加艰难。而到了他所处的黑铁时代,简直就是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相信神明不会对此坐视不管,而是将插手改造并使之又恢复到最初的黄金时代。可见,在赫西俄德看来,历史不过是一种由秩序到混乱、由混乱复归为秩序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一种圆周运动。

柏拉图在其《蒂迈欧》篇中也反映了这种历史思想。他认为人类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共经过 72 000 年。在前一个 36 000 年中,由于造物主的控制,人类还不至于退化,而在后一个 36 000 年中,造物主的控制日益松弛,结果人类不断走向堕落,最后陷入大混乱。

希腊人的倒退循环历史观,不仅反映在其史学,也反映在其诗歌、神话、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诸学术领域之中。

古希腊历史观念的基础是自然本体论。一方面,古希腊人强烈地感受和体验到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动和不和谐;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顽强执著地追求永恒与和谐,并企图用宇宙的本质和秩序的必然永恒来调和变动的事实。他们习惯于将问题指向自然,指向不变的本质,习惯于将个人和人类的一切遭遇和行为都当做根据同样规律自我重复的世界、宇宙变化过程的特殊表现形态。

3. 道德史观

公元前 5 世纪出现了古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的著作中虽然有不少神祇,但已摆脱荷马史诗的传说风格,而是真正的历史了,所以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主要记载了公元前 492—公元前 449 年希腊和波斯的一场战争。修昔底德则是记述他自己参加过的公元前 431—公元前 404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说,这些著作是一种回忆式的记述,类似纪事本末,并且是最近或当代的事情,也都注意到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把发生的事件如实地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成为这个时代史学家共同遵守的宗旨,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罗马帝国时代,李维的多卷本《罗马史》,可说是第一部真正的通史。李维在序中强调罗马民族的道德传统,有浓厚的怀古情绪,把道德作为罗马历史发展的目的。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雄时代的史诗和神话已不再

